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　　华

十八世纪的中国，相当于清朝康熙 40 年(1701)至嘉庆 5 年(1800)，即过去史家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从公元 1701 年向前推移，距清朝建立的 1644 年，已度过了 66 年的艰苦岁月；从公元 1800 年向后延伸，距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不过四十年，距辛亥革命(即 1911 年)，也只有 110 年。

把清朝 267 年的历史，分为清初、清中叶、清末三个阶段，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多少年来习惯的分法，也是比较正确的分法。由于近些年来，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打破桎梏，解放思想，使清代历史的研究有长足发展。据估计：每年都有数十部清史专著出版问世；每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总数有数百篇之多。当前的具体表现是：过去研究过的问题，现在更加深入；过去属于清史研究的荒原，现在正不断有人在拓荒；在五六十年代争论的问题，现在正逐步取得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很正常的。

对于乾隆中期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段历史，过去史学家传统的看法是：乾隆年间，中国社会走上了全盛时期，同时也是由盛而衰的开始。大体上从乾隆 39 年(1774)山东寿张王伦起义始，统治者生活的腐化，政治上的腐败，对劳动人民剥削的加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经济上，也由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走上凄凄惨惨，破败衰微的道路。当时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之前，"虽有发展，但很微弱"。上述看法，我认为在有的问题上，不无商榷之处：

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走下坡路的依据之一是：土地兼并剧烈，高额地租剥削加强。

从一般道理来说，地主阶级凭藉土地所有权，对佃户进行惨绝人寰的高额地租剥削，从而引起广大农民起而反抗，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因素，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只用简单推理的办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最近十多年来，一些史学家通过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乾、嘉、道三朝的刑科题本中，有关租佃关系的档案进行了整理和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它有可能使我们改变过去关于租佃剥削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意见。

这些文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率，自汉代以来，"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就奠定了 50% 地租率的基础。到宋代，业佃地租收取率仍是对半分。明清时期，虽出现了额租制，但地租率仍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上，到乾、嘉、道时期，也不例外。有没有超过 50%地租率的实例呢？肯定是有的。但只有地主给佃户提供房屋、耕牛、农具、种子时，业佃的地租比例才有可能提高到 6:4、7:3 的程度。这就是说，地主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随意提高地租的收取率。因为：过度的榨取，不但会使佃户无法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引起佃户反抗，且使地主本身也失去了剥削对象，对地主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地主阶级，只能采取"养鸡取卵"的办法来对待佃户的剥削。只有到了封建统治再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地主才能孤注一掷，来一次冒险，做一次"杀鸡取卵"的尝试。我们仔细研究了乾、嘉、道时期的剥削率，业佃 8:2 的剥削还没

有见过，7:3、6:4 的例子也不多见。由此可见，在乾、嘉、道时期，地主采取高额的地租剥削率的根据还是很不充分的。

二、乾、嘉、道时期，人多地少，人口与土地存在尖锐矛盾，也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在经济上走下坡路的另一依据。

清代的人口、土地记载数据虽多，但记载的单位和标准是不一致的。因此，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能绝对正确；虽不正确，但还是可用的。从这些数字，也可以计算出当时人口、土地发展的趋势来。

清代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早在康熙中期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人丁己超过了二千五百余万人，再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约有一亿多人，而当时的土地有六亿亩，人均土地五亩，人地矛盾虽然存在，但不是那样尖锐。到乾隆 6 年(1741)，全国第一次用人口为单位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到一百年之后的道光 20 年(1840)，人口增加到四亿一千万人，人口增加了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到乾隆 59 年(1794)，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面积约有九亿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在丰收之年，还可维持生活，一旦水旱灾害发生，人民贫困，生活难以为继，人地矛盾尖锐化，这是铁的事实。

清朝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僚，乃至一般地主，很早就看出；这一矛盾的存在，并想方设法来解决它。如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南方普遍提倡双季水稻的试种，并取得普遍成功；与此同时，将北方旱地的高产作物——玉米等，广泛移种南方各省的山阜高地。乾隆年间，又将从外国传入的番薯，由福建推广到北方各省，使产量翻了几翻。为了抗拒水旱灾害，取得旱涝保丰收之效，在南北各省农村，大力提倡兴修塘、堰、堤、坝；在北方农村，则号召挖掘水井，以资灌溉。清朝政府上下，这种选育粮食品种，推广高产作物，兴修水利，防止旱涝灾害的措施，基本上解决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在乾、嘉、道时期，我们也很少看到因这种矛盾而引起的广大农民颠沛流离或沦为饿殍的现象发生。由此可见，乾嘉道时期，社会经济还没有进入危机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不可能仍停留在非常微弱的阶段。

三、乾、嘉、道时期清政府在财政上出现赤字，这是一些史学家认为清朝社会经济己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的另一个凭证。

社会比较安定，这是研究十八世纪社会历史的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比较安定，并不等于没有战争。从乾隆一朝六十年的统治来看，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连年不断。对西北地区，乾隆二十年对准噶尔的战争，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之乱；对西藏地区，乾隆十五年清军入藏平叛擒杀珠尔塞特，乾隆五十六年对廓尔喀的战争及大小金川之役。从农民起义来看，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起义，揭开了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如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等。到嘉庆元年，又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涉及五省，打击了清王朝。

战争频繁，必然增加军费开支。清朝的军费开支，分为非战时的常规军饷和战时的非常规军费。有人估计，清政府国库的年收入为三千万两，而非战时的常规军饷支出，就占 70% 左右。而战时的非常规军费，鸦片战争前，平均每年支出四百万到一千万两左右。通过上面的草算，在战争时期仅两项军费开支，就超出了国库收入，更不用说其它费用了，当时国库出现赤字也是铁的事实。

从财政史的角度来看，清朝是封建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国家，反映在财政制度上，也必然是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占主导地位。但在战争年代，清政府因战争原因无精力完全控制时，

势必允许各省地方自筹军费，部分地实行地方自行开支，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央财政相抗衡的地方包干财政。

乾隆中期之后，由于战争原因，有时中央集权财政制度，已向地方财政分权过度，与中央集权财政形成了割据状态。但是，从国库来说，虽然出现了赤字，但这些赤字，又由地方财政来补充，还是安然渡过了这一危险期，并没有达到社会经济崩溃的边沿。

四、如果我上面谈的三个问题都是错误的，乾、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如果都在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萌芽仍处于十分微弱阶段，那么在有的重要问题上，是很难说通的。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洋货大量倾销，白银大量外溢。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逐步走向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微弱，官僚资本畸形发展，农村富农经济薄弱，封建地主所有制在农村仍原封不动等等。

中国是何时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其说不一。有人认为：1841 年 12 月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穿鼻草约之后，就预示着中国社会开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的专著引用 1846 年包世臣所说的江南松江府一带农村："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太(仓)布市削大半"(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答族子孟世正》)。认为这就是江南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开始受洋纱纱布冲击，中国社会就开始起了性质的变化。有的认为：这种外国资本的刺激和封建结构的破坏，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完成的。不管它开始于何时，完成于何时，其过程则是缓慢的，逐渐的。

我们反对外因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最终还是使中国资本主义受到压制。这就是我们一贯批判外国资本主义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大门，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外铄史观"谬论的根本原因。我们是内因论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从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 1840 年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仍然处于微弱的"萌芽"状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很快就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其完成的时间，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计算，相距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十年。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资本主义因素——尽管也是微弱的因素，也是质的变化过程。如果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是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萌芽还是那样微弱。1840 年之后，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当中，就起了那样大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以上所谈的四个问题，万变不离其宗，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估计，也就是对鸦片战争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问题。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朽这是事实；但在社会经济上，仍然是向前发展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但不能理解成政治上的腐败，社会经济也必然是衰落的。它们之间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相反的。因为，社会经济的衰落，会使清朝统治阶级生活上的腐朽、政治上的腐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我们对鸦片战争前社会经济客观地看待，看成仍处于上升的阶段；只要我们把当时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再老是人为地强调它的"微弱"，而将其限制在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这对当时历史上某些问题，就有可能正确理解。